

论澳日关系中的政治交流机制和外交战略对话机制

汪诗明

【内容提要】二战后至今澳日关系经历了戏剧性变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两国之间逐步坐实的“准同盟”关系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澳日关系的日益密切既与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存在关联，又与双边关系中日益生成的多维机制有关。在澳日关系的多维机制中，政治交流机制、外交战略对话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交流机制包括高层互访、多边舞台的领导人会晤等，而外交战略对话机制则体现在澳日双边、澳美日和澳印日三边以及澳印美日四边等三个维度。比较来看，双边政治交流机制和外交战略对话机制是基础或主导，三边或四边机制是扩展或辅助，相互之间存在呼应与互动关系。

【关键词】澳日关系；准同盟关系；“印太战略”；政治交流；外交战略对话

【基金信息】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日‘准同盟’关系研究”（18BGJ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水准有多种参数与指标，比如有界定双边关系性质与水平的条约或其他外交关系文件，有体现某一领域合作成果及其前景的协定或备忘录，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体现。还有一种因素看上去显然不如双边关系条约或协定那么显著和受人关注，但对于双边关系的引领和持续发展却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那就是涉及两国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这



里的机制既可以理解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规则、原则或者决策程序，又可理解为体现有关各方共同意愿的协调行动。建立机制是出于维护明确利益的需要，机制化有助于保障可见的利益不受损害。^① 在澳日关系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利于双边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如双边高层互访与交流、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战略对话等。这些制度性安排既是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又在相当程度上维护和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前行。学术界对于澳日关系尤其是目前的“准同盟”关系已有较多的研究，研究主题包括澳日关系的变迁及其原因，^② 澳日“准同盟”关系的形成、影响及其前景，等等，^③ 但对于澳日关系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双边或多边机制却少有关注，专题研究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本文基于对澳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试图揭示澳日关系中的政治交流机制和外交战略对话机制的生成、运作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一、高层互访机制

高层交往尤其是首脑外交是国家关系水平的直接体现。不同于一般外交磋商，首脑外交旨在通过顶层设计来明确双边关系发展方向以及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或提升双边合作水平，或加强双方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的立场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若两国高层互访较为频繁，则说明双边关系发展处在上升期或双边具有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或是安全与防务合作甚至双边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制约。所谓外部环境制约也许是双方所面临的共同局势需要通过高层交流在某些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域达成共识，或者齐心协力解决双方甚至多方所面临或关注的一个共同的紧迫问题。

由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影响力，围绕首脑外交的议程设计往往颇受关注，甚至还带有某些保密成分。正因为如此，双边关系中一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347—348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第559—560页。

② 宋效峰、张立华：《澳日关系之世纪变迁：由地缘敌手到合作伙伴》，《学术探索》2006年第4期；汪诗明：《论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李旭东：《冷战后的日澳政治安全关系》，《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3期；汪诗明：《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③ 具体研究成果，参见汪诗明：《国内澳日“准同盟”关系研究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95—107页。



些重要文件的签署大多安排在首脑外交的议程中。这既是首脑外交的特点所决定的，又是首脑外交本身重要性的一种独特体现。

澳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准同盟”水平，除了存在共同利益这一刚性需求外，两国首脑外交发挥了显著而又独特的作用。在二战后澳日政治关系正常化进程中，首脑外交尤其令人印象深刻。1957年1月，日本外相第一次召见澳驻日大使阿兰·瓦特（Alan Watt），表达了日本政府希望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立场，而瓦特也礼貌性地表达了澳方同样的愿景。^①4月11日，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总理克服了重重阻力到访日本，开启了恢复战后两国政治交往的“破冰之旅”。^②同样，12月28日，日本首相岸信介不顾其国内的重重忧虑以及澳大利亚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公民团体的质疑和反对，应约访澳。这是对孟席斯访日的回访，极具象征意义，表明两国关系在高层交往方面已初步实现正常化，两国高层领导的互访机制初见端倪。对于战后澳日关系来说，政治交往尤其是高层政治交往恢复并进入常态化，甚至形成一种初步的机制，对于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证明，两国领导人互访之后，双边关系发展较快，并于1976年6月签署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Basic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这一条约是由日方首先提出的。日方希望通过缔结友好与合作条约的形式，一是展示两国关系自战后以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成果，二是解决双边经贸合作中，尤其是能源合作领域出现的一些棘手问题，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定指导性原则。我们注意到，从条约建议到最终完成缔约谈判，历时七年有余，其间谈判进程几度中断，令参与谈判的双方代表不抱期望。如果不是两国高层领导进行适时访问和电报交流，这一条约或许不可能产生，而且条约的签署被安排在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

① 日本希望孟席斯总理于1956年访日，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出现以及孟席斯总理访英归来后身体抱恙让这一安排落空。两国外交官此次会晤的目的在于重启这一计划。A. W. Martin, *Robert Menzies: A Life*, vol.1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54.

② “Menzies Due Here Today for 1-Week State Visit,” *Japan Times*, April 11, 1957;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R. G. Menzies and Dame Pattie Menzies to Japan,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New Guinea, 10 to 28 April 1957,” A1980/735,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姆·弗雷泽 (Malcolm Fraser) 1976年6月16—20日对日本的访问日程中。^①

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两国政府首脑的互访更加频繁。鲍勃·霍克 (Bob Hawke)、保罗·基廷 (Paul Keating)、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在任时都曾多次访问日本,而同期的日本首相尽管更迭频繁,但大多在任期内访问过澳大利亚。两国关系也在首脑外交的推动下提质升级。如1995年5月26日,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澳日伙伴关系声明》(Declaration on the Australia-Japan Partnership)正式签署。2002年5月,《澳日创造性伙伴关系》(Australia-Japan Creative Partnership)见证了两国伙伴关系又向前迈进一步。2007年3月,澳日发表了《安全合作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该声明涵盖了相当广泛的合作内容,其中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标志着双边关系有了质的飞跃。^②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澳日关系发展持续升温。这一时期,两国领导人不仅互访频繁,而且建立了所谓的个人友谊。2014年4月5—8日,托尼·阿博特 (Tony Abbott) 总理应邀访日。值得关注的是,4月7日,阿博特受邀出席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特别会议。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要功能是统筹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其议事细节被视为国家绝密。阿博特此行创造了历史,他成为应邀参加日本政府核心安全会议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安倍晋三首相在会议开始致辞时表示,本次会议的召开证明日澳两国间有着牢固的信赖纽带。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两国领导人确认把双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Strategic Partnership) 提升至“新型特殊关系”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③ 7月7—10日,安倍回访澳大利亚。安倍此访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

① 6月16日,弗雷泽总理与三木武夫首相代表两国政府在《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上签了字。参见Moreen De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he 1976 Basic Treaty between Australia and Japan, Australia in the world: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iles no.3,”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6, pp. 1-43。

② 汪诗明:《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第31页。

③ “Visit to Japan of the Hon Tony Abbott, Prime Minist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Overvie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7, 2014, https://www.mofa.go.jp/a_o/ocn/au/page3e_000166.html.



特殊战略伙伴关系”。^①不难看出，两国高层领导年内就实现了互访，而且前后相隔仅三个月。这在澳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澳日高层政治机制已达到很高水准，并为日后澳日高层互访树立了新的范例。

2017年1月14日，安倍首相访问澳大利亚，双方领导人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安全防务、地区秩序、朝核危机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②2018年1月18日，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总理对日本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18日上午，刚刚抵达日本的特恩布尔和安倍一起从日本防卫省乘坐直升机来到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习志野基地，视察陆上自卫队反恐特殊部队，还参观了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PAC-3）等装备。下午，日方邀请特恩布尔出席由安倍主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参加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③特恩布尔是继其前任阿博特总理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后，第三位受邀列席该会议的外国首脑。这一特殊礼遇显示出两国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日本试图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11月16日，安倍再次访问澳大利亚。此访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安排，那就是安倍首相在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总理陪同下造访75年前被日军轰炸的达尔文港，拜谒二战战死者纪念碑，并以此显示战后以来两国关系的和解速度以及高度互信的发展。^④

2020年9月8日，安倍首相与莫里森总理举行了视频通话。安倍在讲话中首先解释了他卸任首相的原因，并且感谢莫里森总理对他的友谊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回忆起在达尔文一起敬献花圈的场面，并认可现在的澳日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⑤这种在卸任前向他国领导人专致问候并解释卸任原因的现

① “Prime Minister Abbott and Prime Minister Abe Joint Statement—‘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v.jp/files/000044543.pdf>.

② “Joint Meeting Outcomes: Visit to Australia b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nuary 14, 2017,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18411.pdf>.

③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urnbull to Japan,” Ambassador of Japan to Australia, January 29, 2018, <https://www.au.emb-japan.go.jp/files/000328909.pdf>.

④ “Visit to Darwin b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edia Release,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pm.gov.au/media/visit-darwin-japanese-prime-minister-shinzo-abe>.

⑤ “Japan-Australia Summit Telephone Tal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eptember 8, 2020, https://www.mofa.go.jp/a_o/ocn/au/page6e_000212.html.



象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常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交流与问候的方式是两国高层互访机制的一种延伸,也是对互访机制内涵的一种补充。11月17日,接替安倍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在东京会晤了来访的莫里森。在日本新冠疫情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莫里森不顾外界的质疑以及反对党的批评访问日本。这一方面说明莫里森此访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恰逢日本新首相上台不久,两国都想借此访来凸显澳日关系的独特一面。这次访问取得了一项对两国防务合作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即两国总理宣布双方在互惠准入的基础上达成部队访问协定。^①这让历时六年多的谈判暂时画上了句号。

2021年2月25日,菅义伟与莫里森进行了电话交流。两国总理一致同意莫里森2020年对日本的访问是富有成果的,并承诺作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继续推动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②10月,岸田文雄接替菅义伟成为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后,一改新任首相一定会把美国当作出访目的地的传统,而计划把澳大利亚作为第一个出访国家。由于受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传播的影响,岸田文雄原计划于2022年1月7日访澳的行程被迫取消,改为视频会议。1月6日,岸田文雄与莫里森举行了线上会晤,并正式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③就加强政治互信、深化防务合作而言,《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双边协定。

从澳日关系的演进来看,首脑互访是双边关系中的一项重要议程。虽然战后至今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多数时候,双边关系中的互信程度不高,致使双边关系中很多条约、协定的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有时还面临夭折的危险,比如前文提到的《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互惠准入协定》就是如此。但在双方领导人的适时介入尤其是在首脑会晤机制的推动下,这些条约或协定大多得以签署。可以说,双方领导人的定期互访机制对加快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最终签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确保双边关系在一个可以预期的轨道上前行,不会因历史问题或其他问题如捕鲸之争等让两国关

① “Japan-Australia Lead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16180.pdf>.

② “Japan-Australia Summit Telephone Tal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mofa.go.jp/a_o/ocn/au/page6e_000231.html.

③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oncerning the Facilitation of Reciprocal Acces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elf-Defence Force of Japan and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nuary 6, 2022,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283786.pdf>.



系出现大的波折甚至倒退。^①这也是澳日关系的一大独特之处。

二、高层政治交流机制

严格而言，高层政治交流是一个广义范畴，它包括了首脑互访。这里所讲的高层政治交流是指首脑互访外，利用多边外交舞台开展的外交方式。在当今世界，虽然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有所抬头，有时会对一国的内政或外交战略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区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仍是大势。这就是近年来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外交仍受到各国政府重视的一个重要背景或原因。当然，一些国家也希望借助多边舞台密切双边或多边政治交往，为本国营造更为有利的战略和安全环境。

（一）澳美日高层政治交流

为了使同盟体系适应复杂多变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形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同盟的管理与经营模式，即在保持自身战略优先的前提下，适当鼓励、支持甚至放任其盟国之间开展双边乃至三边的交流与合作。^②当然，澳日两国也希望与美国建立三边工作关系，因为这样做不仅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澳日之间的合作也因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或机制。由于三国的实力、地位及国际影响力不同，其多边外交的选择也不尽一致。令三国聚焦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近年来成为三国领导人开展高层政治交流的重要场所。

倡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是澳日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设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也是两国政府借此扩大双边合作范围的重要举措。2007年9月8—9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15次非正式会议在悉尼举行。会议开幕前，安倍晋三首相、约翰·霍华德总理以及乔治·布什总统共进早餐，并且非正式地举行了

^① Paul Tait, "Australia PM: Whaling Spat shouldn't be Allowed to Hurt Japan Ties," December 18, 2015, <https://news.yahoo.com/Australia-pm-whaling-spat-shouldn't-allowed-hurt-japan-025601000-sector.html>.

^② E.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 1 (2005): 145.



三国领导人首次会晤。^①这次非正式交流的重要性不但在于其确立了三国高层会晤或交流机制，而且会谈的内容引人关注。三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重点提及区域安全尤其是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并把发展与印度的协作关系作为三国未来合作的一个议题。

2014年11月16日，在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的第二天，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三方会谈，这是2007年后澳美日领导人的首次三方会谈。与七年前三方领导人悉尼首次会晤时的议题较为单一相比，七年后的国际局势已今非昔比，三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较为广泛，包括2014年乌克兰危机、如何击败“伊斯兰国”、如何消灭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以及朝鲜核问题。关于三方防务与安全合作问题，美国表示将持续向达尔文地区派驻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国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开展“更密切的海上安全合作”等。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表达了他们深化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三边伙伴关系以确保亚太地区有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的承诺。他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的不可动摇的根基”，包括对“民主和开放经济、法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②

与澳美、美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相比，澳美日三国领导人会晤的频次的确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亚太地区尚未出现一个让三国首脑均感兴趣的显著或焦点议题。但是，从上述两次会晤的情况来看，一旦形势需要，三国领导人就会利用多边舞台，交流各自对地区或国际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在由三国中任一方主办的多边外交会议期间，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概率大增。对于澳日两国来说，与美国绑在一起就某个地区或国际的热点或焦点问题发出共同声音，是扩大其国际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澳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不得不借重的一条路径。

（二）澳印美日高层政治交流

拜登执政后，“四边机制”是少数得到延续的特朗普时期的内外政策之一。

^① 《澳美日举行首次领导人战略对话》，2007年9月8日，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07-09-08/152213847121.shtml>。

^② “Australia-Japan-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Leaders Meeting Joint Media Release,” U.S. White House, November 16,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5/Australia-japan-United-states-trilateral-leaders-meeting-joint-media-rel>.



2021年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首次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此次会议是在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下的首次领导人会议，也是拜登上台后参加的首场多边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鉴于美日澳等国经常把中国在南海采取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说成是“胁迫”行为，以及把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疫苗所体现的大国担当说成是“疫苗外交”，四国联手针对中国的意味不言而喻。尽管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绝大多数国家都把精力放在抗疫方面，但拜登政府还是希望让这个带有冷战思维的机制运转起来，以此不仅彰显昔日的美国“又回来了”的姿态，给盟国树立强劲同盟的信心，而且在议题设置上与中国“较劲”，试图从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等相对“软性”的议题着手，打压中国。

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美国利用多国政要参会之机，于9月24日实现了四国首脑线下会晤的愿望，这也是当年四国首脑的第二次会晤。举行此次线下峰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凸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立即把战略中心转向“印太”地区来围堵中国的决心和姿态。众所周知，遏制中国崛起以及在地缘战略上围堵中国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但受制于在阿富汗、中东地区的反恐战略以及受困于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难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应对中国的崛起，召开这次峰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其亚太地区乃至欧洲的盟友传达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并借此给盟国输血打气。二是转移国内外舆论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匆忙撤军而给后者带来一片混乱的关注与谴责。这场由美国发起、耗资20万亿美元、以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为代价、历时二十年的战争最后以美军匆忙撤退和塔利班重掌政权的戏剧性场面收场，这令拜登政府饱受批评。召开这次峰会有助于转移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公众的视线，便于拜登政府尽快从撤退的泥潭中脱身。与3月的线上峰会一样，四国首脑在发言时虽然未点名中国，但各自的发言主题都暗含一条针对中国的主线。在“印太”问题、全球产业供应链方面，四国以一个声音说话，以抗衡中国。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四国将继续合作；四国的领导人、外长将每年举行会晤，高级官员将定期会晤。四国的工作组将继续以稳定的速度开展必要合作，以建成更加强大的“印太”地区。^①

^①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这是对“四边机制”的明确重申和进一步发展。

澳印美日高层领导会晤机制是澳美日三边领导人政治交流机制发展的产物。既然这是一个扩展版的交流机制，那么其未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印度主动退出或被踢出局；二是印度继续留在“四边机制”之内，而且四边合作与交流变得更加紧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就澳日关系而言，四方高层交流机制使得双边政治交流又多了一个渠道。这是双方求之不得的，日本是对“四边机制”尤其感兴趣的國家，它希望借此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对中国形成潜在的具有威慑效应的菱形包围圈。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安倍在第一个任期内所推出的这一计划只是昙花一现。这一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日本缺乏影响他国外交战略的实力与号召力。所以，拉拢澳大利亚、讨好美国、劝说印度就成为安倍第二个任期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说，没有安倍的积极游说，“四边机制”很难形成。然而，实现四国领导人的会晤，并建立相应的交流与对话机制，恐怕不是日本能够独立促成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霸权逻辑和独尊意识决定了它对不是由自己提出或主导的多边机制往往采取不合作、不支持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首肯与参与是决定“四边机制”能否形成以及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被认为是美国最忠诚的朋友之一，澳美在地区或国际事务方面大多立场一致，与澳大利亚开展密切合作，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成为日本外交努力的方向。

澳大利亚同样期待美国参与进来甚至起主导作用，这不仅因为澳美是同盟关系，而且在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一直担心美国将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参与。所以在其官方防务和外交战略文件中，澳方始终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维护这一地区和平、安全以及秩序的重要保证。^①这样一来，期待、鼓励和支持美国参与四边高层政治交流就成了日澳的共同目标，而美国的参与也为澳日两国参与亚太事务以及协调对华政策提供了更多的底气，澳日两国的“准同盟”关系的内涵因此而变得丰富起来。

三、外交战略对话机制

战略对话通常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就重大的、关键性的和具

^①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Canberra: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7), pp. 39-40.



有持久影响的议题进行立场交流、意见沟通和战略决策比较,并试图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总体性方针或路线的外交活动。对话的议题不仅涉及泛泛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外交、防务和人文等领域,也可扩展到金融、环保、反恐、网络安全、传染病防治、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战略对话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与信任,发掘更多的合作机会与更大的合作潜力,减少对复杂、敏感局势的误判,增进国际关系的务实化,因而是一种积极的国际关系互动模式。一般而言,大国之间、中等国家之间以及大国与中等国家之间的战略对话较多。因为上述类型的国家不仅国际交往范围广泛,参与的国际性事务较多,而且其国家利益呈现多维属性。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属于中等规模的国家,两国之间历史、文化和地缘战略不同,如今又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亚太国际环境,都希望在区域性乃至国际性事务中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与影响力,甚至协助美国维护所谓的自由、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充当美国亚太战略的北南两锚。澳日双边以及由双方共同参与的三边或四边战略对话通常是在上述背景下启动的。

（一）澳日“2+2”对话机制

澳日外长和防长的“2+2”对话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之际,特别是在安全与防务合作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中重要内容的情况下。2007年3月澳日签署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是双方建立外交战略对话的奠基性文件。该声明规定:“日本和澳大利亚将进一步强化两国外长的年度战略对话,开展防长之间的年度对话,加强外长和防长联合对话,建立定期部长级对话机制。”^①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加强外长和防长的联合对话”首次出现在联合声明中。

澳日第一次外长和防长的“2+2”会议于2007年6月6日在日本外务省举行。日本防卫相久间章生、外相麻生太郎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参加了此次会谈。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举行“2+2”会谈,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如此。这样的比较并非没有意义。虽然澳日关系与日美同盟、澳美同盟难以比肩,但澳日关系的交流模式却套用了日美同盟、澳美同盟的模式。这说明澳日两国对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抱有期待。会后发

^①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表的联合声明重申，澳日将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深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尽快制定行动计划，落实3月签订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约十年后，即2017年4月20日，澳日在东京举行了第7轮外长和防长的“2+2”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澳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的背景下召开的，因而格外受到关注。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成果就是双方在如何加强这一关系方面达成一致。2018年10月10日，澳日第8轮外长和防长“2+2”会议在悉尼召开。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相岩屋毅、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和防长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参加会谈。双方在会谈中确认，力争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定》（Visiting Force Agreement），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开展联合行动提供法律依据。双方还将两国关系明确为“准同盟国”。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2019年年内将实施日本航空自卫队与澳大利亚空军首次战机联演联训；两国将推进协调工作，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实施反潜战和扫雷等联合演习做必要的准备。^①

2021年6月9日，受疫情影响，澳日第9轮外长和防长“2+2”会谈在线上举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岸信夫和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国防部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与会。部长们重新确认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重申双方将共同努力，并与美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维护和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会议取得的成果还包括深化网络安全和关键技术合作，协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与疫苗有关的援助工作，以及加强信息分享。^②

由此可见，双边的外交战略磋商是澳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07年3月签署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这份声明首次将安全合作提升至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催生了“2+2”对话机制。与一些国家的外交战略磋商主要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与纷争不同的是，澳日之间的外交战略磋商主要商讨战略合作事宜，磋商的议题不仅包括扩大和深化双边合作，还包括在本地地区或国际性事务中的合作，比如如何协调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如何应对国际秩序的新变化，等等。可以说，对双边关系而言，澳日外

^① 《明确互为“准同盟国”关系：日澳“2+2”会议谋求制衡中国》，《参考消息》2018年10月12日第16版。

^② “Australia-Jap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epartment of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au/geo/japan/Australia-japan-bilateral-relationship>.



交战略磋商是基础，也是根本，是除首脑会晤机制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机制。

（二）澳美日外交战略对话

外交战略层面的三边磋商概念既非源于对多边概念“情有独钟”的日本，也非处在霸权顶端的美国，而是对中等强国外交较为“痴迷”的澳大利亚。2001年7月，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首次提出“三边安全对话”（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建议，并得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的支持。^①第二年，三方就建立了高级外交人员的对话机制。

早在三边外交战略对话开启前，美日澳三方就已建立一定的互信，并表达了开展三方合作的愿望。三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这两个区域性合作机制的不满、对中国崛起后可能挑战美国统治地位的担忧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对美日的戒心等，是促成三国开展战略对话的外在因素。^②就巩固“三边安全对话”的成果来说，2005年似乎是一个重要年份。是年，澳美日三方高级外交官一系列非正式的外交磋商发展成为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5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华盛顿会晤后宣布，澳美日三国将建立外长级安全对话机制，从而取代2002年建立的高级外交人员对话机制。赖斯表示，三国都认为将安全对话机制上升为外长级将有利于三国更直接地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不过，华盛顿、东京和堪培拉都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有关国家对建立一个正式的“三边安全对话”的关注，并且不希望破坏东盟地区论坛形式的区域多边主义。^③为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唐纳强调，有关安全问题的讨论将不会涉及这一地区的一些敏感问题。赖斯与唐纳都分别与日本外相进行了会晤，一致同意升级对话机制。

2006年3月18日，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悉尼会晤，开启了“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作为长期的民主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我们三国在维护全球尤其是聚焦亚

① P. Jain, “Turning to a New Chapter on Defence,” *Advertiser* (Adelaide), August 1, 2001.

② 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American Acolytes: Tokyo, Canberra and Washington’s Emerging ‘Pacific Axi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eds.,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89.

③ 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American Acolytes: Tokyo, Canberra and Washington’s Emerging ‘Pacific Axis,’” p. 102.



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方面负有共同的责任。这次会晤是加强三边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步骤,反映了我们赋予更广泛的三边合作在处理当代安全问题方面的重要性。这种合作是对我们三国已经建立的牢固安全关系的补充。”^①有分析家指出,“三边战略对话”可能的战略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崛起。^②

2019年8月1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在曼谷举行了第9次“三边战略对话”。三国外长重申了三边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加强三国协调的重要性,承诺三国将与其他国家一道,支持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③这次“三边战略对话”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澳美日三边外交战略对话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象征性对话向务实性对话转变的特点。对话安排由初期的不定期到近年来的定期会晤,讨论的话题由初期的不涉及敏感话题、欢迎中国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到频频涉及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敏感话题、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肆意抹黑等。上述转变都或明或暗地牵涉一条主线,那就是澳美日三国俨然把中国视为它们推行其亚太战略或“印太战略”的假想敌。澳日两国虽然都与中国有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但近年来与中国的高层政治交往一度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奉行对华不友好政策。但无论是日本或澳大利亚,还是两国联手,在外交战略层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抗衡。因此,为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平衡中国在区域性乃至国际性事务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澳日不仅加紧勾连,而且与美国联合起来,希望通过拉帮结派、搞区域小集团来迫使中国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当然,正因为澳日两国在对华政策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并且甘愿充当美国亚太战略或“印太战略”的棋子,所以,美国也越来越重视与澳日两国的三边战略磋商。

①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rch, 18, 2006,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663-2.html>.

② Benjamin Schreer, “Australia’s ‘Special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other ‘China Choi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0, no. 1 (2016): 40.

③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gust 2, 2019,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trilateral-strat>.



（三）澳日印外交战略对话

进入新时期，澳印、日印关系因印度的“东向政策”而不断向好，但三方之间的外交战略互动直到2015年才进入公众视野。是年6月8日，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方在新德里举行司局级外交官会晤，三方围绕“印太”地区局势及海上安全合作等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这是三国间有史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议。此后该对话机制遂进入常态化运作。

2017年4月28日，来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的高级官员在堪培拉举行三边会谈。三方就包括“印太”地区的区域问题和日澳印三边关系等议题交换了意见。^①12月13日，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孙芳安（Frances Adamson）以及日本副外相杉山晋辅（Shinsuke J. Sugiyama）在新德里举行了第四次三边会谈。此次会谈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三方重申了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有越来越多的交集，并对这一地区的“和平、民主、经济增长”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有着共同承诺；支持东盟作为“印太”地区政治和安全结构中心的地位；强调三方在海上安全、领土意识和灾难应对方面进行更广泛合作的必要性。三方表示欢迎这种重要的对话机制的定期会晤，日本提议在东京举行下一轮三边会谈。^②

由于美国不在其中，澳日印三边外交战略对话看上去是一个较为平等的对话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的两个依附盟国联手开展的一次独立的外交行动，也是对美国自“9·11”事件后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阿富汗、中东地区而忽视其亚太盟友做法表达不满的一种反应。当然，这也与澳日各自的“印太战略”有关。因为没有印度的呼应与支持，澳日的“印太战略”就难以推行下去。从新德里方面来说，印度在后冷战时期开始奉行“东向政策”，这一政策需要得到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支持。澳日两国是印度“东向政策”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不难看出，在澳日印三边机制中，澳日之间的合作是基础，印度则是决定这一机制发展向度和程度的重要变量。同理，如果澳日印三边机制不断走向成熟，那么澳日之间的合作不仅增添了一个平台，其互信程度也将随

^① “Japan-Australia-India Trilateral Dialogue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28, 2017,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1567.html.

^② “4th India-Australia-Japan Trilateral Dialogue (December 13, 2017),”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ecember 13, 2017,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76/4th_IndiaAustraliaJapan_Trilateral_Dialogue_December_13_2017.



之增加，这有利于澳日“准同盟”关系的发展。

（四）澳美日印外交战略对话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地震和海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向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澳美日印四国联合成立一个临时“海啸核心小组”，以便协调救助行动。这被一些人视为澳美日印“四边机制”的源起。^①

日本是四边对话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并且希望建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合。在日本的竭力撮合下，在2007年8月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澳美日印四国司局级官员在马尼拉举行首次对话。“四边机制”的倡议刚一出炉，中国方面就表达了忧虑，担心这个合作机制将发展成为遏制中国的“小北约”，并向有关国家提出了正式抗议。^②而澳大利亚国内政局的变化让“四边机制”的建议受到冷落。陆克文（Kevin Rudd）上台后，澳大利亚转而强调发展与中国包括经贸在内的全面关系。2008年4月9日，陆克文总理应邀访华。访华后，澳工党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四边机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陆克文不想过分刺激中国。^③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入主白宫期间，美国也冻结了这一机制。印度方面担心四边机制可能对其传统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其对“四边机制”的热情也随之消减。^④2007年9月接替安倍任首相的福田康夫也不太关注“四边机制”概念，并且试图发展与中国的合作。2012年12月，当安倍时隔五年再次当选为日本首相后，组成“菱形安保体系”来抗衡中国就成为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外交底色，但美国政府对由日本政府主导的这一倡议的反应并不十分积极。当然，日本也不想让日中关系一直走下坡路，所以，“四边机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到了2017年，日本政界又燃起复活“四边机制”的兴趣。10月25日，日

① H. D. P. Envall,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owards an Indo-Pacific Order?” Policy Report, September 2019, https://cs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or-securities-studies/resources/docs/RSIS_PR190909_The-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pdf.

② David Brewster, *India's Ocean: The Story of India's Bid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155.

③ Richard Leaver, “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54, no. 4 (2008): 600.

④ H. D. P. Envall,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owards an Indo-Pacific Order?”.



本外相河野太郎向媒体公开表态，即将恢复“四边机制”，提升四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旧事重提当然与美国总统易人有关，特朗普入主白宫所奉行的单边主义路线既给日本处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出了一道难题，又让日印两国看到了利用美国参与的“民主国家”多边机制打压中国的机会。鉴于自身所处的区域安全环境出现新的变化，印度方面对日方的这一提议给予了及时回应，称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讨论有关增进共同利益的各种问题。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对恢复“四边机制”表现出较大的兴趣，而且主导这一多边机制的意图欲盖弥彰。11月12日，澳美日印四国外交部的司局级官员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四边会谈，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在首次亚洲之行期间以“印太”称呼该地区，意味着美国将对亚太的外交和安全承诺扩大到“印太”范围内。^①

2019年9月，澳美日印四国外长在纽约举行“四边机制”复活后的第一次会晤。次年10月，第二次会晤在东京举行。四国外长就应对疫情暴发与扩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交换了意见，并对南海和东海问题表示关注。四国外长还就继续“四边机制”达成共识。^②2021年2月18日，四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议。虽然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会议主题，但四国外长在会上一致表示，坚持反对任何以武力或强迫方式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2022年2月12日，四国外长在墨尔本举行了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四国有关疫苗在本地区分配、网络安全与关键技术、反对虚假信息、反对恐怖主义、海上安全、人道主义和灾难反应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③

从“四边机制”的缘起和较为曲折的进程来看，应对并且有意遏制中国崛起显然是“四边机制”问世的重要背景或动力。有学者认为，2007年至2008年，让“四边机制”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现在让四国重新走到一起

① 张力：《“印太”视域中的美印日澳四边机制初探》，《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2页。

② “The Second Japan-Australia-India-U.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ctober 6, 2020,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244.html.

③ “Australia to Host Fourth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ebruary 10, 2022,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host-fourth-quad-foreign-minister-meeting>.



的也是中国的崛起。^①而在四国看来,中国日益增长的抱负已对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对欧美长期把控的国际经济秩序构成很大的“威胁”;对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说,它们认为有必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特朗普坚持奉行“美国第一”单边路线下,如何让美国继续留在这一地区,来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②总之,无论是四国对共同价值观的强调还是对“印太”地区所谓自由航行的关注,其地缘政治色彩都非常浓厚。在强调四国防务与安全磋商的同时,充实伙伴关系的经济合作内容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表面上看,这是四国加强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或重要方向,但其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暴露无遗。

在“四边机制”形成过程中,日澳两国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这一机制的源起要归于国际社会对自然灾害的一次合作应对,但让四国走到一起进行外交战略磋商的建议是由日方提出的。日本提出这一建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共同价值观的掩护下谋划持久的对华战略,并且给其打上了西方国家的集团色彩。澳大利亚于2008年的意外退出则让日本灰头土脸,但也无计可施。这一事实表明,在日本出台的与亚太或“印太”事务有关的战略中,澳方给予的支持显得相当重要。2017年,日本方面看到了复活这一沉寂十年的机制的绝佳时机。一是自2012年日本“购买钓鱼岛”闹剧以来,中国实现了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常态化巡航,日本“找补”的心态非常急切;二是澳中关系在2017年下半年因澳方一系列对华错误言行而开始出现下滑;^③三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四是2017年中印关系因印度边防部队越界造成的洞朗事件而出现紧张状态。以上事态让日本看到了复活“四边机制”的希望。在日本与其他三国的双边关系中,日美虽是同盟关系,但特朗普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朝令夕改的风格令日本有时无所适从;日印关系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但印度外交政策的变数较大,有时令人难以捉摸。相比较而言,日澳关系持续向好,是令日方感到放心的一组双边关系,而且澳大利亚是四国中第一个出

① H.D.P. Envall, “Japan: From Passive Partner to Active Ally,” in Michael Wesley eds.,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5-30.

② H. D. P. Envall,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owards an Indo-Pacific Order?”

③ 汪诗明:《当前澳中关系新变化及其深层原因探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0期,第70—78页;丁工:《中澳关系的问题分析及加强两国合作的政策选择》,《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第88—99页。



“印太战略”的国家,^①所以,“四边机制”复活的基础是日澳联手。在日方看来,如果“四边机制”能够复活成功,那么不仅证明日方的这一外交倡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表明日澳“准同盟”关系在应对一些区域性问题或挑战时是有用武之地的。

四、结束语

二战后至今,澳日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即由战后初期的“冷和平”步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友好与合作阶段,发展为90年代中期的伙伴关系、21世纪初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至今天的“准同盟”关系。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种族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太吻合的地缘战略等因素,澳日关系的这种变化在国际关系史上确实不多见。在分析澳日关系不断变迁且日益密切的原因时,可以发现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但当经贸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使双边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延伸时,合作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或挑战就无法避免。这些问题或挑战中,有些是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可以通过磋商找到解决之道;有些可能涉及国家利益中的敏感问题,并因双方存在的历史问题而变得复杂化,需要建立战略磋商机制予以应对。可以说,澳日关系中的政治交流与外交战略对话机制是双边关系不断拓展、走向深化的结果。

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战争经历,所以高层政治交流尤其是首脑会晤在双边关系中不仅非常敏感,而且极其重要。当双方合作利益向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推进时,就需要两国的相关部门进行战略磋商与对话。而外交战略对话显然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因为外交战略磋商不仅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拟定了较为清晰的框架,而且为其他相关部门的战略磋商奠定了基础或创造了有利氛围。本文并没有提及双边关系中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比如经贸、防务与安全合作、人文等领域。一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机制都是高层互访或政治交流机制和外交战略磋商机制衍生的产物;二是双方高层互访或政治交流、外交战略磋商的议题大多涵盖上述领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澳日关系中的这些交流与合作机制处在不断的扩展和完善之中,且相互之间存在呼应与互动关系。这不仅表明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交流与合作机

^①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3), p.7.



制的引领与支撑，而且意味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处在分裂状态的背景下，^① 澳日双边关系将在多维机制的支撑与作用下进一步发展。

^① 施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第19—36页。



An Analysis of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Exchange and of Strategic Dialogue on Foreign Affairs in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WANG Shimi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hip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change, particularly since entering into the new century. The *de facto* quasi-alli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Japan is related to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as well as the emerging mechanisms in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latter,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exchange and mechanisms of strategic dialogue on foreign affair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e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exchange include mutual high-level visits, leaders' meetings in multilateral venues, etc. The mechanisms of strategic dialogue on foreign affairs include three layers: Australia-Japan bilateral dialogue, Australia-US-Japan trilateral dialogue or Australia-India-Japan trilateral dialogue, and Australia-India-US-Japan quadrilateral dialogue. Comparatively, bilateral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exchange and strategic dialogue are the basis or mainstay, while trilateral or quadrilateral mechanisms serve as extensions or play an auxiliary role. They echo and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Keywords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hip; quasi-alliance; Indo-Pacific strategy; political exchange; strategic dialogue on foreign affairs

Funding This paper is the initial outcom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Study on Australia-Japan 'Quasi-Alliance' Relations" (No. 18BGJ064).

Authors Wang Shiming, professor 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